

澄清与辨析:关于生态翻译学的中观研究

黄瑞¹,王园²

(1. 洛阳理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河南 洛阳 471023;

2. 郑州大学 外语与国际关系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中国本土研发的生态翻译学二十多年来既受到了译界学者广泛的肯定和褒扬,也经历了相关人士的异议和商榷,这些都是十分正常的和有益于发展的;然而,其间也出现了因误解关键概念而曲解生态翻译学内涵的情形。本文拟通过阐释生态翻译学中观研究的重要理念,回应王剑的质疑文章,澄清其误解,辨析其误读,吸收其合理观点,相信会有利于生态翻译学理念的厘清,促进该中国原创翻译理论体系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中观研究;隐喻类比;生态平衡;文本移植;适应选择

Clarifications and Scrutinization: Theoretical Studies at the Meso-level of Eco-Translatology

HUANG Rui¹, WANG Yuan²

(1. Foreign Languages School, Luoyang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uoyang 471023, China; 2.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Abstract: Eco-Translatology, an indigenous theoretical discourse system, has received many favorable affirmations and commendations as well as a few disputes and doubts during its development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Among various discussions and comments, however, a few reviewers misunderstood some key concepts and misinterpreted the connotations of Eco-Translatology.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theoretical studies at the meso-level of Eco-Translatology, aiming to respond to Wang Jian's critical appraisal by clarifying misunderstandings, identifying misreadings, and taking in rational views. The authors believe that the clarifications will help better understand Eco-Translatology and further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etical discourse system of eco-translation studies that originated from China.

Key words: theoretical studies at the meso-level of Eco-Translatology; metaphorical analogies; eco-balance; textual transplants; adaption and selection

1. 引言

生态翻译学是“建立在自然生态与翻译生态同构类比基础上,用生态视角综观翻译的研究范式”(Hu 2020:70);即“从新生态主义视角综观与描述翻译”(胡庚申 2021a:178),历经二十多年发展,作为一项“自主创新的学术研究”,已形成独特的翻译理论话语体系,犹如参天大树,上有枝繁

叶茂、分类明晰的宏、中、微观理论分支;下有根深蒂固、中西合璧的新生态主义翻译观,汲取了西方生态主义、东方生态智慧、生物适择学说作为理论根基。近年来,生态翻译学相关研究迭出,其中应用性阐释居多,也有一些理论性探讨(许钧 2018;孟凡君 2019;方梦之 2020;王宁 2021;刘军平 2022;蓝红军 2022 等)。在学界关注、鼓励、批评与鞭策下,生态翻译学理论体系日趋成熟完善;然而其中对生态翻译学重要理念误读的情形也时有所闻。

王剑(2021)文章“生态翻译学在纯理导向性研究维度的问题剖析”(以下简称“王文”),主要依据胡庚申(2013)专著《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以下简称“胡著”)的第四章,即从“‘纯理’导向性”维度剖析第四章“中观译论”,认为其因“类比视角的局限与价值预设的掺入,研究陷入理想化的主观状态,客观性及普适性均存在不足”(王剑 2021:85)。我们认为,王文在议题讨论的前提、论据、结论等方面存在比较明显的问题,有必要做出辨析和澄清。

2. 生态翻译学“中观译论”的研究定位问题

生态翻译学是从宏观译学、中观译论、微观译本三大维度构建的理论体系。中观研究是对翻译学理、特别是“四译”说(何为译、谁在译、如何译、为何译)等翻译本体理论问题的研讨(胡庚申 2013:262,2021a:179)。王文承认生态翻译学“包含着‘纯理’(pure)、“应用”(applied)、“伦理”(ethical)和“元理”(meta theoretical)等旨趣各异的研究维度”,认为生态翻译学中属于 Holmes “纯理”维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胡著第四章“中观译论研究:翻译本体理论”部分(王剑 2021:86),并对中观译论研究提出多处质疑。笔者认为,其对“中观译论”的定位有偏差。

客观的研究定位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前提。诞生于 21 世纪初的生态翻译学,发祥地和“主战场”在中国。“生态翻译学不是按照西方翻译理论的认识论来建构的”(胡庚申 2021a:176),而是独创了融合中西方生态思想、以“生”为本的向“生”译道(同上 2021b:5),是与西方译论范式、问题域指向、学理路径、理念内涵等方面有诸多差异的中国译论体系。“中观译论”不仅仅包含“纯理”,当然,“中观译论”中有可归为“纯理”的部分,能够接受该角度的评述和检验。

为深入辨析,现依据王文对“‘纯理’导向性翻译研究”的描述,同时依据胡庚申生态翻译学论著对“中观译论”的原始阐述,将二者主要任务和学术旨趣对比,详见下页表 1:

由表 1 可见,二者虽在部分维度有交叉,但在是否明确翻译原则、彰显翻译主体、指导实践、规范伦理、探讨策略、厘定标准等层面均存在差别。

在二者的“交叉关系”中,中观译论有没有可以算作“纯理”维度研究的部分呢?提及“纯理”维度研究,要追溯到 1972 年 Holmes 在第三届国际应用语言学会议上提出的翻译研究整体框架,以及 Toury(1995:4)为其整理的翻译研究架构图。Holmes(1988:71)将“pure translation studies”作为翻译学科的两大大分支之一,与“应用翻译研究(applied translation studies)”并列,被翻译学界普遍译为纯翻译研究或纯翻译学(蓝红军 2020;傅敬民 2019),包括描述翻译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和理论翻译研究(theoretical translation studies)。五十年来,针对该译学架构进行探讨、改进和重新阐释的研究不断涌现。有的质疑批判,提出架构图不足以概括翻译学科整体,忽视了回答翻译之“应该”问题的规约性翻译研究(张冬梅 2015:25);有的增删改造,如方梦之(2013:82,83)提出取消“纯研究”层次,彰显应用翻译理论的位置;张美芳(2017:19,20)补充了“描写”“应用”分支;有的还原重构,如朱健平(2018:82)指出图里的架构图未能展现霍姆斯构想全貌,并依据霍氏原文还原了全图;有的另起炉灶,如蓝红军(2015:17)将翻译学理论分为规范性、哲学性、分析性、描写性四种,将霍姆斯的翻译架构图划归“分析性理论”……“当代翻译研究已在许多方面超越了霍氏当初的设想”(朱健平 2018:82),霍姆斯提出的译学目标、译学架构的分类法的适用性不断被

质疑(张冬梅 2015:28;张美芳 2017:23)。

表1“‘纯理’导向性翻译研究”与生态翻译学“中观译论”对比

	“纯理”导向性翻译研究	生态翻译学“中观译论”
主要任务	“探索翻译现象是什么样(描述)”“为什么会是这样(解释)”“背后有何规律(预测)”(王剑 2021:86)	“对翻译实质、翻译过程、翻译策略、翻译标准阐述和对翻译现象解释,以及对译论的哲学理据等基本要素进行系统探讨和综观描述”(胡庚申 2013:179)
学术旨趣	“与‘应然’层面的价值预设无关,探索翻译现象在‘实然’层面的纯粹之理”(同上:86)	“致力于认识翻译本质、描述翻译过程、明确翻译原则、彰显翻译主体、厘定翻译标准,回归‘译有所为’等”(同上:175)
	“不指导翻译转换之实践”(同上:86)	“理论应当与实践互动”“不认为理论可以脱离实践、‘纯之又纯’”(同上:185)
	“不规范翻译人伦之义务”(同上:86)	“彰显‘译者中心’的翻译行为理念与‘译者责任’的翻译伦理原则”(同上:176,190)
	“不探讨翻译研究之方法”(同上:86)	“‘翻译即生态平衡’、‘翻译即文本移植’可作为翻译的策略或方法加以运用”(同上:230,243)
	“于好坏、善恶、利弊等价值判断无涉”(同上:86)	“‘整合适应选择度’的厘定即‘翻译的评价与测定标准问题’”(同上:239)

因此,在对霍姆斯翻译研究整体框架的不同理解、不同诠释、不同做法等众多说纷纭的情况下,在世情、国情、译情等诸多不同的前提下,王文完全依照西方学者半个世纪以前的译学框架中的“纯理”维度为标准,来评判一个21世纪在中国本土创始的翻译研究体系的中观研究部分,是否合适呢?

显然,生态翻译学理论体系并非在霍姆斯翻译学科架构内展开,但若说中观译论与霍氏“纯理”研究任务确有重合,那么笔者认为,中观译论的“四译说”中,仅“何为译”的“翻译即适应选择”可归为纯翻译学研究中的描写翻译研究。而“翻译即生态平衡”和“翻译即文本移植”既属于“翻译理念和认知”,又“可作为翻译的策略或方法指导实践”(胡庚申 2013:242),严格来讲不属于纯翻译学研究,更接近于蓝红军(2015:17)对翻译理论归类当中的“规范性翻译理论”,其“关注理论对实践的价值指导”,重视“基本翻译立场”。“谁在译”强调翻译过程中的“译者中心”,“译者责任”和“事后追惩”属于翻译伦理,“如何译”关注翻译过程和策略选择等实践,“为何译”强调“译有所为”,均无法划归“纯理”范畴。

王文还对生态翻译学的普适性提出疑问,但其描述却是对胡著的断章取义,详见下页表2:

表2 王文对生态翻译学“普适性”的描述与胡著对比

王文描述	胡著描述
“胡庚申多次表示生态翻译学对翻译现象的描述和解释在整体上具有普适性(同上: 22, 191, 373)”(王剑 2021:87)	“初步显现出……普适性”“普适性……是生态翻译学致力于追求的”“普适性将会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来”(胡庚申 2013: 22,191,373)

对比可见,胡著原文是生态翻译学“致力于追求”“初步显现”“越来越明显地呈现”普适性,而绝非王文所言“多次表示”“具有普适性”。在2018年10月26日郑州召开的第六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上,胡庚申主旨报告特别强调,生态翻译学“并不是对所有翻译现象必须具有 description(描述性)或者 prescription(规定性)”。

事实上,对翻译理论期待绝对的普适性,“会影响到翻译理论的创新与翻译理论研究的深入”(林克难 2017:8),是不适宜的。曹明伦(2019:3)也指出,“翻译学界对‘纯翻译理论’的理解有偏差,以为‘纯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没有关系”。凌驾于现实和实践之上,空谈“纯理”的客观性与普适性,是否本身是一种与现实脱节的悖论?从该角度看,王文逻辑似不攻自破了。

3. 对生态翻译学与生态学同构隐喻术语内涵的厘清

生态翻译学根据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关联性、类似性和同构性(胡庚申 2010:1),借鉴生态学的“生存适应”“择优求存”等原理,经改造、转换,通过同构隐喻和概念类比,引入翻译学,形成了一系列生态术语。其中“平衡”“移植”“适应选择”等重要术语,在王文中遭到连续误读。其论述呈现的知识性谬误,以下将逐条澄清。

3.1 王文对“翻译即生态平衡”的术语阐释和论证

3.1.1 “生态平衡”概念内涵的厘定

王文认为,自然生态系统中的“平衡”是“量化概念”,并以胡著对翻译生态环境中的平衡“未做明确定义”为由,自拟该语境下的“平衡”定义(王剑 2021:87)。为辨识真知,辨正曲解,表3拟将王文、词典和胡著中的“生态平衡”定义对比展示;而表4则将王文、胡著的“翻译生态平衡”定义对比展示。

表3 自然生态系统中的生态平衡定义对比

王文定义	词典定义	胡著定义
“‘平衡’在自然生态系统中本是一个量化的概念,指物质/能量的输入量和输出量之间达至动态的相等和稳定。”(王剑 2021:87)	“生态系统发展到成熟的阶段,它的结构和功能,包括生物种类的组成、各个种群的数量比例以及物质和能量的输入、输出等,都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李庆臻 1986)	“如果输入和输出在较长时间趋于相等,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长期处于稳定的状态,在轻度干扰下,能通过自我调节恢复到原初的稳定状态,这种状态就叫做生态平衡。”(胡庚申 2013:16)

表4 王文和胡著中的“翻译生态平衡”定义对比

王文“翻译生态平衡”定义	胡著“翻译生态平衡”定义
“关于在‘翻译生态环境’中何所谓平衡’，胡庚申未做明确定义，但根据其阐述，主要是与顾此失彼的含义相对，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翻译生态环境’中各方面因素的兼顾折中和不偏不倚。”(王剑 2021:87)	“是综合因素的整体平衡，既包括翻译生态平衡，又包括文本生态平衡……‘翻译群落’生态平衡……跨语言、跨文化的整合与平衡……内在、外在因素……宏观、中观、微观思维的整合与平衡。”(胡庚申 2013:198)

由表3、表4可见，王文有偷换概念之误、臆造定义之谬、用词绝对之嫌。

首先，王文忽视了该术语为“生态平衡”而非“平衡”，即便王文“平衡”定义也强调“动态的”，与其“翻译生态平衡”定义中的“不偏不倚”自相矛盾。词典“生态平衡”定义强调“相对稳定”。因此生态平衡是相对而非绝对的，动态而非静态的，不是量化概念。

其次，胡著对“翻译生态平衡”有明确定义，王文却称“未做明确定义”，臆造生态翻译学理论体系已有的重要概念。

最后，胡著定义强调“综合因素的整体平衡”，并未苛求“兼顾折中和不偏不倚”。

3.1.2 王文关于“翻译即生态平衡”的三方面描述和论证

王文把“翻译即生态平衡”视为“一个全称判断”并将其归纳为“三方面描述”(王剑 2021:87)。从逻辑上看，王文误把单称命题“s 是 P”当做“所有 S 是 P”，即“断言第一个类中所有元素都是第二个类的元素”的“全称肯定命题”(欧文·M.柯匹等 2007:214)。实际上，“s 是 P”等价于“所有 S 是 P”合取“有 S 是 P”(同上:296)，故“翻译即生态平衡”并非“全称判断”。王文质疑存在逻辑前提错误。

王文还引用胡著作为论据，但其引用内容却与胡著原文有较大出入，比较鉴别见表5：

表5 王文对“翻译即生态平衡”三方面描述与胡著原文对比

王文“翻译即生态平衡”三方面描述	胡著原文
1)“译者总是能够使原文……一切要素均在译文中得到兼顾折中的传达”“如胡庚申(2013:198)提到的原文的‘实用价值’和‘美学价值’……平衡”(王剑 2021:87)	“就语言生态平衡而言，译者就要致力于保持原语与译语的词义平衡、句意平衡，‘传神’与‘达意’的平衡，实用价值和美学价值的平衡，文风的平衡等等”(胡庚申 2013:198)
2)“译者总是能够使源语和译入语各自特征在译文中得到兼顾折中的体现……如胡庚申提到的……‘文风’……平衡”(同上:87)	
3)“译者总是能够使……‘诸者’各方面需求在译文中得到不偏不倚的满足(胡庚申 2013:200)”(同上:87)	“需要保持……整体的和谐与平衡”“考虑作者、读者、原文、译文等多方因素的……协调与平衡”“译者在作者与读者之间寻求平衡点……”(同上:200)

由表5可知，王文引用时并未忠于原著，而是片面引用、添油加醋。

首先，王文前两条描述是拆分提取了胡著对“翻译即生态平衡”阐释中有关“语言生态平衡”论述的只言片语，不仅略去了“要致力于”，还反复添加“总是能够”“一切”“兼顾折中”“不偏不倚”等绝对化修饰语，偏离了原著本意。

其次,据考证,王文第三条描述所标胡著 200 页根本没有“译者‘总是能够’‘不偏不倚’地满足‘诸者’各方面需求”,只有“考虑……协调与平衡”“寻求平衡点”等,王文引用不足为凭。

接着,王文提出“翻译即生态平衡”与“翻译现象在经验世界中的实际情况均存在不符”,并对三方面描述逐条论证,而这些建立在歪曲原著的描述基础上的论证,可靠性从何谈起呢?以下对已证伪的“兼顾折中”“不偏不倚”等不再赘述,王文三方面论证详见表 6:

表 6 王文对“翻译即生态平衡”三方面描述的论证部分

1)“译者往往……对……某些要素予以重点传达,其他要素则受到淡化甚至被迫牺牲,而并非总是……兼顾折中……梁实秋翻译莎剧就更多地传达……‘实用价值’而牺牲了……‘美学价值’。”(王剑 2021:87)
2)“译者在许多情况下要么更多地采取‘异化’策略……要么……‘归化’策略……而并非总是能够使源语和译入语……风格特征……兼顾折中的传达。”(同上:87)
3)“‘诸者’在趣味和利益上……存在对立冲突……译者……往往优先考虑和满足权势方……忽略甚至牺牲弱势方……并非总是……不偏不倚……”(同上:88)

由表 6 可见,王文的三方面论证使用了“往往”“在许多情况下”“要么”等修饰语,缺乏事实依据,信度不足。

第一方面,王文所述译者在翻译生态环境“要素之间取舍”,甚至“牺牲”部分要素。倘若如此,译文整合适应选择度^①则偏低,难以在新的生态环境中“生存”和“长存”,文本生命岌岌可危,还会影响译者声誉;另外王文举例说明梁实秋的莎剧翻译“很大程度上牺牲了美学价值”,该观点不乏争议,如李建军(2016:94)认为其翻译“具有永恒性质的理想之美”。

第二方面,“异化”和“归化”属于“二分概念(dichotomous concepts)”非此即彼的翻译观,“往往难以有效地描写和指导动态变化的翻译活动”(宋志平、胡庚申 2016:108)。“高度‘依归’于原语或译语生态的翻译,并不符合‘翻译即生态平衡’理念”,仅对“非常规的文本”有时适用,严格地讲,“不宜冠以‘生态翻译’称谓之”(胡庚申 2013:286)。

第三方面,首先,王文对何谓“权势方”“弱势方”未明确说明。倘若译者都如王文所言,谄上欺下、缺乏“自律”,产出“牺牲弱势方”的译品,从长远来看,将不利于译品的生存和长效,限制译者自身发展,导致翻译生态失衡。其次,在翻译伦理层面,译者的中心作用受译者责任的制约。“生态翻译学的制约机制,能促使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具有‘责任意识’与‘平等态度’”(罗迪江 2017:59)。罔顾“译者责任”的译者,在“事后追惩”机制下,翻译生态环境“适者生存”“汰弱留强”法则必将对其给予“他律”和“约束”。

综上,王文先是进行了歪曲原著的描述,然后对曲解后的内容加以批评,其论证缺乏依据,难以自圆其说。“翻译即生态平衡”倡导译者“致力于”翻译生态的协调与平衡,并非绝对化地判定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总能做到平衡。

3.1.3 王文对“翻译即生态平衡”普适性和客观性的质疑

在对“翻译即生态平衡”普适性的质疑中,王文转述胡著例子,却将例子的前提和结论颠倒,二者比较鉴别见下页表 7:

^① “整合适应选择度”是生态翻译学中评判译文的标准,即“多维度的‘选择性适应’和照顾到其他翻译生态环境因素的‘适应性选择’程度”(胡庚申 2013:114)。

表7 王文对胡著的转述与胡著原句对比

王文转述	胡著原句
“从胡庚申的论述和举例中都可以看出,‘翻译即生态平衡’所描述的仅仅是‘公认的、较有影响的译品’(参胡庚申 2013: 199)……无法代表所有翻译现象。”(王剑 2021:88)	“从翻译实践验证的角度看,大凡‘公认的、较有影响的译品’,其‘双语’(原语和译语)生态的平衡相对处理得较好。”(胡庚申 2013:199)

如表7所示,胡著举例说大凡“较有影响的译品”“‘双语’生态的平衡相对处理得较好”,在逻辑上,显然前者是后者的“充分不必要条件”,王文竟将其误当作“充分必要”条件,逆推出“‘翻译即生态平衡’描述的仅是‘公认的、较有影响的作品’”的结论,得出普适性不足的断言。该推理违反了“可靠的演绎论证中,前提一定是结论的充分且必要条件”(田洪璠 2021:135)这一逻辑原理,因此该演绎论证的结论和衍生的断言均不可靠。

在对“翻译即生态平衡”客观性的质疑当中,王文称该理念“实际上是把‘应然’混淆等同于‘实然’,把研究者个人理想化的价值预设混淆等同于经验事实”(王剑 2021:88)。

该论断的准确性值得探讨。首先,正如“翻译即生态平衡”的英文术语“Translation as Ecobalance”中“即”的译文是“as”,可理解为“can be viewed as”(可视为),即从生态平衡视角看待翻译,并非将翻译等同于平衡。类似表达在学界很常见,如“翻译即‘再叙事’”(Translation as Renarration)(Mona Baker 2014),“翻译即跨语言文化的交际”(Translation as Communication 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Juliane House 2015),“翻译即隐喻”(Translation as Metaphor)(Rainer Guldin 2016)等,都是从不同视角探讨翻译。

其次,“翻译即生态平衡”中的“生态平衡”可理解为动作名词(action noun)。译者“删繁就简”“添枝加叶”等翻译行为,“就是在译语生态里做‘平衡’工作”(胡庚申 2013:244)。该理念不是说翻译就意味着平衡的生态,而是说翻译应去做“平衡工作”,寻求翻译生态环境的动态平衡。

最后,根据翻译伦理,译者肩负着维护原语和译语生态平衡的责任,从而“使原语文化在译语文化中能以独特的方式和谐地共存”(Hu 2020:75)。因此翻译的过程应是追求译文在翻译生态环境中的动态平衡。故“翻译即生态平衡”本意即“应然”,而非“实然”。

3.2 王文对“翻译即文本移植”质疑的理据

生态翻译学中,“翻译即文本移植”是把翻译视为“一种动态的文本生命的移植过程”(胡庚申 2020:6)。王文质疑“文本移植”隐喻遮蔽了原语和译文的差异性(王剑 2021:89),详见表8:

表8 王文对“翻译即文本移植”质疑的观点及理由

王文对“文本移植”的质疑观点	“以植物移植隐喻性地描述翻译,夸大了源语和译入语之间的同一性,淡化甚至遮蔽掉了差异性……与事实不符……与‘翻译即生态平衡’的描述相悖……”(王剑 2021:89)
理由一	植物移植,“前后仍是同一植物”,本质是“挪动”;翻译转换,源语和译文是“彼此独立的两个文本”,是“增生”。(同上:89)
理由二	植物移植意味着它“在原有生态环境消失”以及“对原生态环境资源的挪用和掠夺”,会导致“生态失衡和破坏”;文本经过翻译,原本并未消失。(同上:89)

生态学和翻译学毕竟跨学科,植物移植和翻译现象有相似也有差异,但并不意味着无法隐喻类比。隐喻性思维是“科学思维的一个重要途径”,“新隐喻”是在“对喻体和本体之间的差异有明确认识”的前提下使用的,通过二者的相似性传达某种新信息,有助于从“新角度”认识事物特征(束定芳 2000:25,27)。“翻译即文本移植”隐喻,强调文本所处生态环境的变化,即“空间上的拓展性”,侧重点在“移”,关注文本内在的“可移植性”,即“可译性/不可译性”(胡庚申 2013:342-343)。类比法是把有共性也有差别的事物联系考察,旨在强调共性。生态翻译学术语隐喻类比的可行性基于“翻译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似性”(Hu 2020:62)。生态翻译学是“从生态视角探讨翻译问题”,并非“简单、机械地照搬套用”生态学原理(胡庚申 2013:219,220)。

从逻辑上看,类比隐喻运用的类比推理是“或然的”“是通过联想、想象得来的”(徐盛桓 2018:18)。因为当把一个对象的某属性推广到与之类比的对象上去时,“推移属性有可能是两类对象的差异之处,结论所断定的范围超出了前提给定的范围,结论自然是或然的”(郭彩琴 2007:221)。因此王文对“隐喻类比”作“等同”要求是错误的。

王文质疑的两个理由也有待商榷。理由一,首先,“植物移植前后仍是同一植物”的描述并不精确,正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移植也可能使植物性质发生变化。其次,王文认为“移植”本质是“挪动”,这一理解有明显偏差。“挪动”仅表达了“位移”这一行为,离开土壤、罔顾对新的生态环境的适应,“挪动”会造成植物凋零,因此“挪动”不足以概括“移植”本质。“移植”不单是“挪动”,更是追求对新的生态环境的适应,以达到“适者生存”的效果,其内涵是“生态性”的体现和“生命性”的维持,寻求文本在译文生态中“诞生、生成、成长与发展”(胡庚申 2020:8)。最后,原语和译文是“彼此独立”吗?根据生态翻译学以“生”取向的阐释,二者“应具辩证统一的共生关系”(胡庚申 2020:8)。

理由二强调植物移植意味着“在原有生态环境消失”,造成“挪用、掠夺”原生态环境资源和“生态失衡”。植物移植确实可能出现该情况,而翻译现象不会导致原语“在原有生态环境消失”。实际上,“移植”隐喻在翻译学界早已有之,如“文化的传播移植是译者需要担负的一项重要任务”(张志强 1998:31)，“隐喻翻译的最高目标是透过语言表层实现隐喻移植”(肖家燕、李恒威 2010:109)等。试问“文本移植”隐喻多大程度上会引起误解,让读者以为“移植”后,原语会“消失”呢?

王文建议将该描述替换为“翻译即文本增殖(reproduction)”,理由是动植物增殖意味着:1)“子代的增生而非亲代的消失”;2)“子代和亲代因遗传既有相似又有差异”;3)“子代出生后需适应所处生态环境”(王剑 2021:89)。该观点看似有理,但“文本增殖”一是无法突出文本内在的“可移植性”,二是无法凸显从源语言转换到目标语言后,译文所处的语言生态环境已发生的本质改变。动植物增殖前后,子代和亲代仍在相同或相近的生态环境中,因此“文本增殖”无法传达翻译生态环境的变迁。

3.3 王文对“翻译即适应选择”质疑的理据

王文把“翻译即适应选择”划归西方“理性选择论”并提出质疑。为澄清“误释”,王文与胡著对该理念的阐释对比见下页表9。

根据表9,首先,王文判断“翻译即适应选择”是“理性选择论”,带有“‘固有的’理想化预设”,类似于“博弈论”,却未给出依据。“理性选择论”强调个人的行动原则是最大限度地获取效益,“博弈论”强调个人行动是社会行动的基础,二者多用于经济学领域。理性选择论中的“理性”与生态翻译学“整体、关联、动态、平衡”的“生态理性”(胡庚申 2011:97)完全不是一码事。

表9 王文对“翻译即适应选择”的阐释与胡著对比

	王文	胡著
原理	“本质上是一种‘理性选择论’”“跟博弈论类似”(王剑 2021:90)	“借用和转意严复译著中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胡庚申 2013:86)
解读	“本质上是一种理性选择论”“类似博弈论”“带有理性选择论所固有的‘理想化预设’”“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总是处于理性状态,总是能够对‘翻译生态环境’中方方面面的诸多因素进行了解和掌握……最终做出理性的选择”(同上:90)	旧解:“我们曾从翻译适应选择论的视角解读翻译:翻译的过程就是译者的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被翻译生态环境因素所左右的选择活动”(同上:204)
		新解:“翻译过程是译者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和以译者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对译文的‘选择’”(同上:87,232)
评价	“‘理想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该尽可能做到适应和选择’混淆等同于‘所有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实际上总是会进行适应和选择’”(同上:91)	“翻译活动中,译者/译品的所谓‘适’或‘不适’、‘强’或‘弱’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同上:116)

其次,“适”或“不适”是相对的,“翻译即适应选择”并未声称所有译者均能对“翻译生态环境”诸方面因素做到“理性”适应和选择。王文中的“总是处于理性”“总是能够……对诸多因素……了解 and 掌握”,有主观臆断和添油加醋之嫌。

综上,“翻译即适应选择”不是“理性选择论”“博弈论”“理想化预设”,而是阐明翻译是译者主导的适应和选择的过程,类似于“描写性翻译研究”。王文观点或其批评的前提错了。

接着,王文以“不具备‘语境’意识的译者”“压力下的职业译者”“糟糕的翻译”谈不上适应和理性选择,“单词翻译”这种“教学性翻译”无法用“适应选择”描述为例(王剑 2021:90,91),质疑“翻译即适应选择”。

不符合生态理性选择的“糟糕的翻译”,根据“适者生存”法则,其译文生命无法在译语生态环境中“长存”。而单词翻译教学的过程,是指导学生在能力范围内选择最适宜的译文与原文相匹配,以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要求。如教学中“一带一路”的英译“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使用“倡议”(initiative)而不用“战略(strategy)”“项目(project)”“计划(plan)”“规划(agenda)”等,是因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进行地缘战略博弈的筹码,而是为国际社会创造共同发展机遇的倡议;摒弃“One Belt, One Road”译法,是因为英语中“One”往往表示数量“一”,汉语“一……一……”四字结构中的“一”并非实指,而是指代抽象事物,“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有不止一条路线。该名詞翻译涉及政治、经济、传播学等领域,需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完全可以用“翻译即适应选择”解释。

王文再次错将“翻译即适应选择”当做“全称性的描述判断”,认为“诸多反例足以将其证伪”(王剑 2021:91)。综上可知,这些例子均囊括在“适应/选择”理论解释范围内。

4. 就生态翻译学“求存”动机、“伦理”等问题与王文商榷

关于“求存”动机,王文认为生态翻译学“仅以译者的‘求存’动机对翻译现象目的性解释”,并举例说“本能翻译行为”不受目的性动机支配、“比经典翻译更具普遍性”,却无法用“求存”解释,

得出生态翻译学客观性和普适性不足的结论(王剑 2021:92)。

首先,王文仅以“求存”动机为例验证普适性,太过片面。生态翻译学倡导“译有所为”,译者主观动机很多,包括“求生、弘志、适趣、移情、竞赛等”(胡庚申 2013:247),王文将“求存”单列陈述是不合理的。其次,“全世界有超过 2/3 的儿童都成长于双语或多语环境”(王剑 2021:92)缺乏依据,其“本能翻译更具普遍性”断言的真实性存疑。

其次,关于“翻译伦理”,王文谈到“‘他者平衡和谐’伦理”和“译者肩负着对‘自我’的伦理”,指出目前二者的阐发“尚显表浅”、关系“缺乏阐述”(王剑 2021:92)。然而在生态翻译学相关论著中,根本没有相关表述,这两个概念属于王文作者个人误读,在此基础上的批评,难以令人信服。

5. 结语

通过以实为据的回应和阐明,我们澄清了生态翻译学中观研究重要理念。我们认为,王文从以 Holmes 为代表的西方翻译认识论的视角,乃至跨学科地使用理性选择论、博弈论等视角审视生态翻译学,对生态翻译学“纳入超越国界的多元理论要素”(胡庚申 2021a:181)、探索东西方共通的话语体系,从而获得国际译界更广泛的认同,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同时,这些探讨也有助于丰富和完善生态翻译学阐释的角度。然而,综观其大部分质疑,都源于缺乏系统研究,未参透生态翻译学核心理念而造成的误读误判:有些是论据引用不充分,对生态翻译学中观译论曲解后加以评述,在错误的前提下做出推论;还有些是在描述和批判中有意添加了生态翻译学论著中从未出现过的术语或极端化修饰语。这些都是译论批评中应当避免的。

我们认为,批评者不应盲从西方的某种理论或标准,而应树立理论自信,用与时俱进的眼光审视本土新兴的翻译理论话语体系。

我们深信,在译学研究者批评、理论应用者检验与学派团体自建的合力驱动下,理论建设将会日趋完善,期待更多研究者参与到这一中国本土译论话语体系建设中来。

参考文献:

- [1] House, J. *Translation as Communication 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M]. London: Routledge, 2016.
- [2] (Hugs) Gengshen Hu. *Eco-Translatology: Towards an Eco-paradigm of Translation Studies*[M]. Singapore: Springer, 2020.
- [3] Holmes, J. S.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C]// Holmes, J. S. *Translated! Paper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Amsterdam: Rodopi, 1988 (2nd ed., 1st ed. in 1972). 66 - 80.
- [4] Baker, M. Translation as Re-narration[C]// House, J. S. *Translation: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158 - 177.
- [5] Guldin, R. *Translation as Metaphor*[M]. London: Routledge. 2016.
- [6] Toury, G.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M].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5.
- [7] 曹明伦. 翻译理论是从哪里来的? ——再论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关系[J]. 上海翻译, 2019, (6): 1 - 7 + 95.
- [8] 方梦之. 应用翻译研究:原理、策略与技巧[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3.
- [9] 傅敬民. 我国应用翻译研究:回顾与反思[J].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36(5): 93 - 104.
- [10] 郭彩琴. 逻辑学教程[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 [11] 胡庚申. 生态翻译学的理论创新与国际发展[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a, 51(1): 174 - 186.

- [12] 胡庚申. 生态翻译学: 建构与诠释[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 [13] 胡庚申. 以“生”为本的向“生”译道——生态翻译学的哲学“三问”审视[J]. 中国翻译, 2021b, 42(6): 5-14.
- [14] 胡庚申. 翻译生态 vs 自然生态: 纲领性、类似性、同构性[J]. 上海翻译, 2010, (4): 1-5.
- [15] 胡庚申. 文本移植的生命存续——“生生之谓译”的生态翻译学新解[J]. 中国翻译, 2020, 41(5): 5-12.
- [16] 胡庚申. 生态翻译学: 生态理性特征及其对翻译研究的启示[J]. 中国外语, 2011, 8(6): 96-99+109.
- [17] 蓝红军, 冯丽霞. 翻译理论建构的多元融合——生态翻译学 20 年(2001—2021)之启思[J]. 中国外语, 2022, 19(1): 105-111.
- [18] 蓝红军. 译学理论何为——对我国翻译学理论研究的思考[J]. 上海翻译, 2015, (1): 16-20.
- [19] 李建军. 理性与人性——论梁实秋莎学研究的路向与意义[J]. 南方文坛, 2016, (6): 92-99.
- [20] 李庆臻. 简明自然辩证法词典[M]. 山东: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6.
- [21] 林克难. 论翻译理论的普适性与唯一性[J]. 东方翻译, 2017, (3): 8-11.
- [22] 刘军平. 生态翻译学之三大哲学价值功能[J]. 上海翻译, 2022, No. 162(1): 1-8+95.
- [23] 罗迪江. 关于生态翻译学相关问题的再思考——对尹穗琼商榷文章的回应[J].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7, 24(3): 63-68.
- [24] 孟凡君. 论生态翻译学在中西翻译研究中的学术定位[J]. 中国翻译, 2019, 40(04): 42-49.
- [25] 欧文·M·柯匹(Irving M. Copi), 卡尔·科恩(Carl Cohen). 逻辑学导论[M]. 张建军, 潘天群, 顿新国等,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 [26] 束定芳. 论隐喻产生的认知、心理和语言原因[J]. 外语学刊, 2000, (2): 23-33.
- [27] 宋志平, 胡庚申. 翻译研究若干关键问题的生态翻译学解释[J]. 外语教学, 2016, 37(1): 107-110.
- [28] 田洪鑫. 批判性思维与写作[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1.
- [29] 王剑. 生态翻译学在“纯理”导向性研究维度的问题剖析[J]. 外国语, 2021, 44(4): 85-93.
- [30] 王宁. 生态翻译学: 一种人文学术研究范式的兴起[J]. 外语教学, 2021, 42(6): 7-11.
- [31] 肖家燕, 李恒威. 概念隐喻视角下的隐喻翻译研究[J]. 中国外语, 2010, 7(5): 106-111.
- [32] 许钧. 开发本土学术资源的一面旗帜——《生态翻译学: 建构与诠释》序[C]//许钧. 译道与文心: 论译品文录.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8.
- [33] 徐盛桓. 言辞翻滚风云 论证显现智慧——从类比隐喻运用审视隐喻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J]. 外国语, 2018, 41(6): 16-25.
- [34] 张美芳. 后霍姆斯时期翻译研究的发展: 范畴与途径[J]. 中国翻译, 2017, (3): 18-24.
- [35] 张冬梅. 翻译学的实证性学科定位再思——霍姆斯、图里翻译学架构图问题思考之一[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5, 38(6): 23-29.
- [36] 朱健平. 完整再现霍尔姆斯翻译研究学科构架图[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18, (4): 75-83.
- [37] 张志强. 信息足度与文化移植[J]. 上海科技翻译, 1998, (4): 29-3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生态翻译学的理论创新、国际化发展及数据库建设研究”(18BYY022)

收稿日期: 2022-05-11

作者简介: 黄瑞, 硕士, 讲师, 副研究员。研究方向: 生态翻译学。

王园(通讯作者), 博士生, 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 生态翻译学。